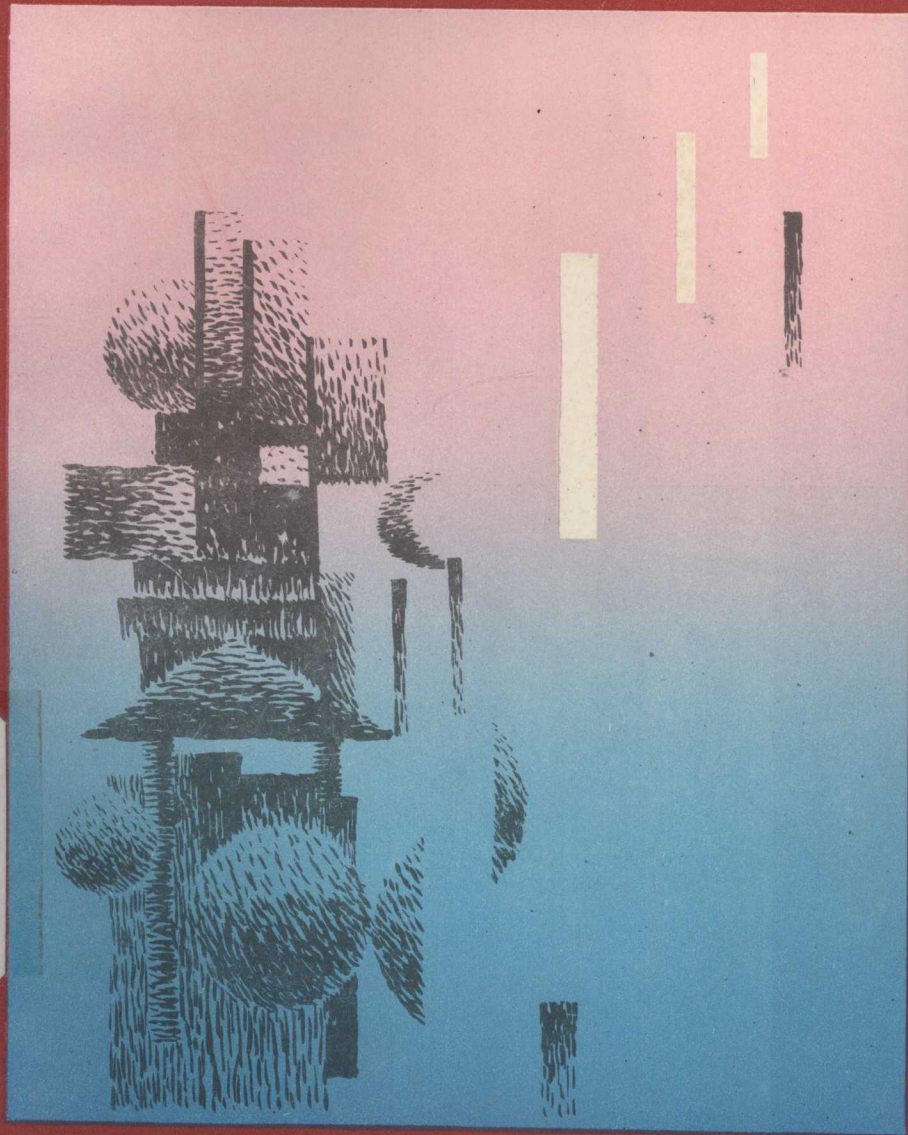


台湾长篇小说论

黄重添

台湾文学论丛



海峡文艺出版社

台湾长篇小说论

台湾文学论丛

黄重添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年·福州

台湾长篇小说论

——台湾文学论丛

黄重添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7.75印张 2插页 187千字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34—216—4

I·197 定价：3.15元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台湾长篇小说的方位与特点	(1)
第二章 孤儿的历史与历史的孤儿	(22)
第三章 在逆境中扬起进发的风帆	(42)
第四章 游子情思与寻根意识	(60)
第五章 心灵在传统与现代撞击中 躁动	(80)
第六章 难却人间未了情	(98)
第七章 故园在他们梦里重现	(115)
第八章 以血以泪编织的文学	(129)
第九章 对台湾现态的深刻反省	(147)
第十章 病态的社会病态的人	(166)
第十一章 他们在迷离中沉沦	(182)
第十二章 三言两语话武侠	(197)
附录一：台湾出版长篇小说部分书目	(216)
附录二：大陆重印台湾长篇小说部分 书目	(233)
后 记	(241)

第一章 台湾长篇小说 的方位与特点

在台湾新文学的茫茫原野里，如果说，中短篇作品中是朵朵艳丽夺目的烂漫山花，那么，长篇小说则是株株苍劲挺拔的参天大树，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其中，既有人人所共知的名篇，也有大陆读者比较陌生的佳作，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然而，只要从文学史角度作整体观照，我们不难确定它在台湾新文学发展座标上的方位，并透视出其基本发展轨迹。

考察任何一种文体的创作态势都不能脱离文学的大背景。从台湾新文学的格局中看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它们发展的几个阶段大体一致。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台湾新文学，至1945年台湾光复，虽然30年代中期曾一度出现繁荣，但在漫漫的文学长河里，它还只能算是童年时期。尤其不少作家改文言文或日文写作为白话文创作，因语言文字上的障碍给他们带来一定困难，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而且，相对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创作难度更大，它不仅要求作家对生活要有更丰厚的感受，对社会有更深刻的探究，还要求作家必须具有更炽热持久的创作激情，掌握更加娴熟的艺术

技巧。而在当时，日本殖民当局为扑灭台湾岛上熊熊燃烧的抗日斗争烈火，严加控制思想文化领域，作家们不可能在宽松的环境里殚思竭虑，自由自在从事于长篇小说创作，如吴浊流1943年至1945年间创作的《亚细亚的孤儿》，就是“冒日警逮捕之险”^①的。因此，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寥寥无几，我们知道的仅有赖庆的《女性悲曲》，林辉焜用日文写作的《不可抗争的命运》、吕赫若的《台湾的女性》和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等。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台湾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及其英勇不屈的反抗与斗争。

50年代，跟随国民党当局去台湾的文人作家中，一部分人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这些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大陆时的军中文职人员。他们到台湾后，在“战斗文艺”与“军中文艺运动”口号的鼓吹下，为迎合国民党当局“反共抗俄”总方针的需要，创作了一批以反共题材为内容的长篇小说，主要有明秋水的《惯贼的嘴脸》，陈纪滢的《女匪干》、《荻村傅》、《赤地》，王蓝的《蓝与黑》，姜贵的《旋风》和呼啸的《仇》等。这些作品歪曲历史，编造材料，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描写“恐怖的独裁与暴虐”、“阶级斗争的流血与恐怖”、“经济上的经济斗争”，充满着一种“积极、战斗的反共意识”^②。这样的创作已完全失去了它的文学价值，只能充当八股式的政治宣传工具。台湾文界指出：这类反共作品，“太过于概念化，太过于生硬”^③。连写过反共小说的朱西宁，也不得不承认：“直接的反共文学，最易辨识，因它具有明显而强烈的政治立场和色彩。”^④另一类是纯文人。他们创作了相当数量反映婚姻伦理

① 吴浊流：《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见《吴浊流作品集⑤》。

② 葛贯宁：《四年来“自由中国”小说的动向》。

③ 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

④ 朱西宁：《论反共文学》。

的小说。它除第五章要介绍的孟瑶、郭良蕙等作家的创作外，还有潘垒的《金色的年代》、《血液》，杨念慈的《金十字架》，王逢吉的《三个女性的塑像》，穆穆的《三十五岁的女人》和尹雪曼的《苦酒》等。另外，台湾省籍作家钟理和的《笠山农场》和从大陆返回台湾故乡的林海音的《晓云》，也创作于这个时期。

这里，有必要对“反共文学”多讲几句。原先有一种似乎没有人表示异议的流行观点，即50年代的台湾文坛充斥着反共文学作品，而且由于它材料失真，八股僵化，面目可憎，已失去了作为文学的基本特性，因此60年代初很快就夭折了^①。这大概是对反共文学创作缺乏全面了解的一种笼统看法。台湾反共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殊不知，60年代以后，台湾仍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反共文学作品。它除被评论界视为典型的反共小说《重阳》（作者姜贵）于1961年发表外，其他的多在1965年之后出版。主要有：张放的《惊涛》（1968年）、司马中原的《青春行》（1968年）、《荒原》（1973年）、《复仇》（1974年），姜贵的《白马篇》（1974年）。另外，还有几部反共意识比较明显的小说，也都于这一时期出版，如尼洛的《近乡情怯》、赵滋蕃的《子午线上》、林太乙的《丁香遍野》和段彩华的《五个少年犯》等。直至80年代，反共文学作品仍时有出现，如1982年出版张放的《远天的风沙》。其实，反共文学既然是为迎合反共政治需要应运而生，只要国民党当局没有改变其反共立场，它就不会销声匿迹。如果联系诸如王文兴的《龙天楼》、履疆的《雪融千里》等反共中篇小说的出现，我们更没有理由说它早于60年代初就“夭折”了。另一点要说明的是，一旦提起朱西宁、司马中原、姜贵等人，就将他们与“反共作家”划等号。这也是不确切的。他们的创作情况比较复杂。固然他们写了一些反共文学作品，但

^①参见黎澍评：《台湾的〈文学语言学〉（上）》，《资料与信息》1988年第4期。

也创作了相当数量或描写旧中国历史变迁，或反映爱情婚姻问题，或表现旧中国社会动乱，或回忆已逝岁月等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司马中原的《割缘》、《绿杨村》、《流星雨》、《骤雨》、《春迟》，朱西宁的《画梦记》、《猫》、《春风不相识》，姜贵的《烈妇峰》、《碧海青天夜夜心》、《花落莲成》、《曲巷幽幽》等。总之，在台湾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这批从大陆去台湾作家的创作，数量相当可观，有些作品艺术水平也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它是我们研究台湾长篇小说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

60年代，随着台湾新文学的发展，长篇小说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创作景观。从作家群看，它除上述两部分作家外，又活跃着另外两种类型的作家。一是台湾省籍的作家；二是由大陆去台湾的第二代年轻作者。在台湾省籍作家队伍中，应首先提到钟肇政。他是当代台湾长篇小说创作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作品《鲁冰花》于1961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后，在台湾文坛引起强烈反响。这是一部描写当代台湾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给当时日渐“西化”的台湾文坛吹来了带着泥土芬芳的春风，告示沉没了一个时期的乡土文学又重新崛起。据说，台湾著名学者张良泽就是在读到《鲁冰花》以后，才下决心走乡土文学道路。继之，钟肇政又先后创作了《浊流三部曲》（1962—1963年）、《大坝》（1964年）、《大圳》（1966年）等。《鲁冰花》描写一个名叫古阿明的贫农儿子的短暂一生。他自幼具有绘画天赋，受到青年画家郭云天的赏识。郭云天顶住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克服生活上的困难，竭尽全力要将古阿明培养成才。然而，由于专制教育制度的摧残，古阿明不幸患病早逝。小说通过对郭云天慧眼识英才与古阿明遭遇的描写，批判了腐败的教育制度，并引发人们对如何保护与培养人才的关注。

著名台湾旅美作家於梨华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文学生涯的。她于1961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梦回青河》，也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曾在《皇冠》杂志连载，又在电台“小说选”节目中播出，并改编成电视剧播映。至1963年，该书再版了6版。随后，於梨华又陆续推出几部长篇作品。它们是：《变》（1965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1967年）、《焰》（1969年）等。《变》是一部反映伦理问题的小说。它以美国华人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仲达与妻子李文璐之间的感情纠葛。他们结婚10年，生男育女，表面看去生活十分平静，但由于两人性格、兴趣不合，实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一次偶然机会，李文璐认识该校戏剧系教授唐凌，两人一见钟情，直至发展到李文璐弃家出走与唐凌同居。然而，李文璐日子过得并不快乐。她渐渐感到，王仲达虽然没有唐凌那种令她倾慕迷乱的男性风度，但唐凌却没有象王仲达那样真诚可靠，加上时刻惦记着安琪、安琪两个孩子，在经历了一番灵与肉的剧烈搏斗后，终于又回到了王仲达身边。於梨华通过描写由于无爱婚姻引起的感情矛盾，表达了她对女性不幸遭遇的怜悯与同情。於梨华在卷首开宗明义写道：“为一些过了做梦的年龄而仍然无法放弃梦，在现实的生活中又无法屈服于现实的女人们——也许不快乐，也许不是不快乐——而写。”《焰》与《变》不同，它反映的是台湾的现实生活。小说以台湾大学一个学生社团——众欣社的活动为中心，开展对社会人生的描写，也穿插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表现了以众欣社骨干赵中为代表的台湾青年勇于批判黑暗、探究人生的叛逆精神和忧国忧民、疾恶如仇的不屈品格。

7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环境与岛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着重批判台湾社会弊端的中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大量涌出，在一段时间内几乎成为台湾当代文学的主潮。此外，还发生了已超出学术范

国的乡土文学论争，给台湾文界带来了一定的政治压力。然而，这一些都没有对长篇小说创作产生负面影响，它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除上面提到的各种类型的新老作家继续从事他们各自擅长的创作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李乔的《削瘦的灵魂》，钟肇政的《绿色大地》、谢霜天的《梅村心曲》和宋泽莱的《变迁的牛眺湾》等。

《桑青与桃红》创作于1974年，是一部寓言体小说，描写了一个中国人在动乱中因逃避追捕造成精神分裂的故事。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从年仅16岁的小桑青逃难写起，到解放前夕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旧中国的动乱，到在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桑青的丈夫沈家纲的追捕，直至在美国已改名为桃红的桑青受移民局驱赶。在不太长的篇幅里，概括了从1945年至1970年20年的时间和在大陆、台湾、美国这样广阔的空间所发生的故事，把桑青痛苦的流浪生活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通过个人的不幸遭遇表明旧社会的腐朽黑暗，大陆解放后人民的欢乐，以及台湾、美国社会的恐怖。作品的内容如此之宏富，反映的生活层面如此之广阔，揭示的主题如此之深刻，都远远超过聂华苓1963年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该作艺术手法运用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和两个故事，双线并行的结构形式，也是聂华苓之前的创作少见的。借此一端，足见聂华苓在拓发的艺术道路上，正在不停地探索着，显示出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一个‘安份’的作者所作的一个‘不安份’的尝试”^①。

《削瘦的灵魂》1976年出版，讲述一个师专学生因无法适应专制的教育方式，又无力抗拒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成为这种教育制度的牺牲品。这是一部含蕴作者自传色彩的小说。作品里的那个师专学生就叫刘武雄，正是七等生的本名。而在《七等生

^①聂华苓：《〈桑青与桃红〉·前言》。

生活与创作年表》^①中，我们发现在1958年栏目下有这样一段记载：“因跳上餐桌跳舞被勒令退学，二星期后，由洪文彬老师作保复学，随后因教材法不及格重修一年。”“当年轻时我非常痛恨贫穷，因为它使我在整个学校教育的期间受尽了欺侮和折磨。”七等生的这个经历，正是《削瘦的灵魂》的主要情节。小说通过对刘武雄上学艰难的描写，鞭辟入里地揭露与抨击专制的教育制度。它具备着与《鲁冰花》类似的认识价值。

谢霜天的《梅村心曲》（1974年）、钟肇政的《绿色大地》（1974年）和宋泽莱的《变迁的牛跳湾》（1979年）是三部直接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梅村心曲》由《秋暮》、《冬夜》、《春晨》三部作品组成，它不仅是一曲歌颂农村与田园的大地之歌，更是一部台湾农村历经艰辛发展繁荣的史诗。《秋暮》写1931年至1938年间在日本统治下台湾农村的暗淡凋零；《冬夜》写1939年至1948年间台湾农村经受的种种苦难；《春晨》写1949年至60年代初台湾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并出现了中兴的迹象。而《绿色大地》与《变迁的牛跳湾》则是反映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出路问题。《绿色大地》描写农村学校青年教师郭茂村，眼看农村劳力大量外流，农民生活日益困苦，心急如焚。为能使农村摆脱困境，他在学校女教师姚玉鲤的无私资助下，实施砾耕实验农场计划，终于获得成功，即将荒芜的农村又重新出现了“绿色大地”，农民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变迁的牛跳湾》从更广阔的角度反映台湾农村深远的历史流程。牛跳湾是台湾中央山脉西部浊水溪下游的一个村庄。小说通过对李寅一家艰难生活历程的描述，反映出牛跳湾20多年来的历史变迁，进而尖锐地提出了超越自然秩序的现代文明与承袭自然秩序的传统文化之冲突在农村引起的深刻震荡，以及农民如何寻找新的生活出路。这是宋

^①见《当代十大家小说选集·七等生小传》。《〈梅村心曲〉新编》（林青甫）

泽莱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的一大特色。台湾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出路是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重要问题。50年代初，台湾曾实行“和平土改”，一个时期内农村出现繁荣。自60年代开始，由于社会日益资本主义化，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已适应不了畸形发展的工商经济，广大农民陷入了新的困惑。①“他们没有现代化记账计算的知识，缺乏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精神和技术。此外，他们更没有能力将农产品运销到各个消费市场，将农产品卖给国内和国外的消费者”②。宋泽莱1976年创作的中篇小说《打牛浦村》之所以使他一举成名，正是由于它没有停留在表现农村凋零凄惨的惨象上，而是专注于台湾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注意揭示造成农村破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出路问题。》

六、七十年代台湾还出版了一定数量的长篇历史小说。我这里所讲的历史小说不包括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创作。有人将钟肇政的《台湾人三部曲》、李乔的《寒夜三部曲》也归入历史小说。这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长篇小说作家群中，从事历史题材创作者不多，现今为广大读者熟悉的仅高阳一人。高阳本名许晏骈，字雁冰，浙江杭州人，1922年生。年轻时在上海读大学，早年在军队服务，1960年进入新闻界，后为《联合报》撰写连载历史小说，1962年成为职业作家。多年来，已出版70多部作品，拥有众多的读者，不论在大陆、台湾、香港及其他华语地区，都深受欢迎。高阳曾在由台湾远行出版公司出版的《高阳作品集》的“自序”中谈了他的创作情况：“从事历史小说写作以来，二十余年心血所积，得书若干？计字又若干？说实在连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约略而计，出书总在60部以上；计字则平均日写三千，年得百万，保守估计，至少亦有两千五百万字。”创作历史小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有人写历史小说着眼于“古为今用”，强

①许南村：《试评〈打牛浦村〉》，见《知识人的偏执》。《小说大十讲》页①

调要穿越历史的帷幕，要在现代意义上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使历史题材“现代化”。而高阳有他自己的历史小说文学观。他说：“历史是我写作的主要题材，也是我的兴趣。搞历史小说的目的之一，便是唤起同胞对历史的温情。”^①要达到“唤起对历史的温情”，其前提条件便是要尊重历史。以《慈禧全传》为例。高阳把历史真实作为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目标，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真实地再现“辛酉政变”至“辛丑条约”慈禧太后掌权40余年间清宫惊心动魄的政治生活内幕，反映清朝后期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史实。从文宗皇帝与其弟六皇子奕祈失和、慈禧从中渔利，到慈禧与奕祈出于私欲开始新的勾心斗角，到沙俄侵犯伊犁，清统治者被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到围绕办海军修铁路等问题，清宫内部又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到外国联军入侵北京，李鸿章与敌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直至日俄宣战、日本割据中国东北领土，最后70余岁的慈禧太后在清朝没落的哀歌中去世。这一些，都是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真实事件。然而，作为史与诗结合的历史小说，它既要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又需体现文学的形象性。这一点高阳也注意到了。我们读《慈禧全传》，获得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人物形象塑造相当成功，尤其慈禧太后这一核心人物，写得很有立体感。高阳几乎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多层次地揭示出慈禧太后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之避免脸谱化与模式化。另外，细节描写也十分出色，它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艺术光彩。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论及历史小说创作时说：“属于这类小说的好作品，需要许多条件。首先，需要大力钻研与工作；他必须有藏书家细读一本大书的耐心，而得到的却只有一件事或者一句话。其次，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根据一大

^①转引奕时超：《访台湾著名小说家高阳》，见《文学报》（上海版）1989年4月6日。

。其001张第甲8201封第出文文图。《文艺报》第134期。

批书的零星材料，创造出来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时代的全貌”要这样，“光有对一个时代的一般看法，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一切属于历史范围，作者于此之外，还得添加上小说家的才具、强大的创造力、细节的精确性、对感情的深刻体会等等。”①从《慈禧全传》中，我们看到了高阳已具备如同巴尔扎克所说的创作历史小说的必要条件——丰富的历史知识与娴熟的艺术造诣。

进入80年代，随着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发展，长篇小说也呈现出新的创作局面，其中题材趋向多样尤其引人注目。通观近10年来的长篇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除原来较多描写的爱情婚姻题材、历史题材、武侠题材等外，还出现了政治小说题材、企业家生活题材、环保题材、青少年问题题材、海峡两岸亲缘题材等。

历史刚刚跨入80年代，青年女作家肖丽红与郑宝娟同时推出长篇小说《千江有水千江月》和《望乡》，并一起进入1980年度《联合报》长篇小说奖决赛圈。而且，她们都以诗句作书名。“千江有水千江月”是一句古诗词，而“望乡”则是一句现代诗。它也许是一种巧合。这两部作品的一个共同性特点是题材和写法上都比较新颖。《千江有水千江月》虽然也涉及到爱情婚姻问题，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言情小说，其包容的社会生活显得更为丰富。小说通过描写当代台湾一个姓萧家族中的少女阿贞观的成长历程以及她与大信的一段恋情，反映出了中国传统习俗与悠悠人情。肖丽红不仅写出了这个大家庭中兄弟、姐妹及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亲情、爱情，而且还写出了他们的生生死死，悲欢苦乐。其中，有许多人生无可奈何的矛盾冲突的纠缠，更有与人为善的宽容与厚重，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蕴藏的深沉爱心与古朴温纯的品格。这部小说意境深远，格调高雅，别有一番风韵。全书以江水、明月的意象贯串始终，它犹如一江春水那样深邃宽泓，又似江上明

①《巴尔扎克论文选》，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页。

月那样清雅高洁，尤其是，适时引入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更是令人神往。该作以其新颖的风格得到本届长篇小说奖评委的肯定，终以全票击败《望乡》夺取桂冠。评委主席齐邦媛认为：“这篇小说（指《千江有水千江月》——引者），我觉得很像西方的诗情小说。书中她用江水而不用河水，来象征人生象一种文化一样，是慢的，是沉稳的，是深的，是宽的。”评委郑清文说：“台湾继承着大陆的许多优良传统，却没有人把它表现出来。读这部小说，我才感觉到许多久藏地下的东西，终于被挖出来了。”《望乡》虽然落选，但评委对它基本还是肯定的，甚至有人建议作为佳作给予奖励。《望乡》是郑宝娟读台湾大学外文系二年级时创作的。也许受西方现代文学，尤其现代诗影响较深，这部小说似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结构，它剖析一群青年人的心态以及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看上去倒是一部很不错的心态小说。作品主要描写了一男三女。男青年叫陈建悟，女青年是丁南华、许瑞云和罗玉珊。他们都生活在不健康的家庭环境中，这就使得他们对人生的阴暗面看得比别人更详尽深切，对自身价值的追寻也比别的年轻人早一点。小说以大学联考为背景、写他们的孤独与迷乱，也写他们对人生、友情、爱情真谛的追寻。这便是郑宝娟在作品中所指出的：有四个特异的、超出同龄孩子生活的智能范围发展以外的故事。这四个少年人，在团体里自然受孤立，因此他们就寻找伴侣，互相吸引，建立一种友谊^①。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台湾文坛出现了不少以大学联考为背景，描写青少年心理情状的创作，但多为中短篇小说，如吴念真的《抓住一个春天》、许梦君的《迎一野阳光》等，而长篇小说几乎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望乡》对于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的开拓是值得重视的。

^①见郑宝娟《望乡》第47页，1984年2月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